

# 华侨研究

暨南大学华侨研究所编



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

# 华 侨 研 究

暨南大学华侨研究所编

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

---

责任编辑 詹家鑫

华 侨 研 究

■南大学华侨研究所编

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

广州人民印刷厂印刷

32开本 8.9375印张 193千字

1988年12月第1版 1988年12月第1次印刷

印数1—3000册

ISBN 7-3361-0005-1/K·2

定价 3.50 元

## 前 言

华侨研究所自1981年成立以来，在各级领导的关心支持与全所人员的努力工作下，出了一批成果。这些成果，有专著、论文和调查报告。我们曾经把论文部分分别编辑印成《华侨史论文集》（四集）和《华侨教育》（二辑）。专著方面，我所名誉所长朱杰勤教授主编、有所研究人员参加撰写的《东南亚华侨史丛书》中的《菲律宾华侨史》和《印尼华侨史》，已由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。近年我们除了继续完成重点项目之外，还写出一批论文，其内容包括华侨历史、华侨人物、华侨教育、华侨经济等方面。现在我们把这些成果以及所外提供的个别论文汇集成这本《华侨研究》论文集，奉献给同行和关心华侨、华人问题的读者。

在编辑、出版这本论文集的过程中，得到广东高教出版社的协助，责任编辑唐家豪同志认真审阅文稿，提出了许多宝贵意见，得到中国华侨历史学会的关心和支持，我们特地在此致以衷心的感谢。

由于我们的水平有限，本书错漏之处在所难免，望读者批评指正。

徐 善 福

暨南大学华侨研究所 1988年11月

---

## 目 录

---

|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      |
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|
| 前 言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徐善福   |
| 1 古代中国与文莱的关系及华侨的活动                   | 张应龙   |
| 23 试论日本横滨的华侨社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罗晃潮   |
| 49 1905年中国人民抵制美货的运动                  | 刘汉标   |
| 74 战后初到马来亚华人的政治地位<br>(1945--1957)    | 张应龙   |
| <hr/>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      |
| 103 星洲诗人丘菽园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朱杰勤   |
| 126 爱国华侨的楷模<br>——纪念彭泽民先生诞辰 110 周年    | 关 卫   |
| 154 郑藻如使美期间的护侨工作                     | 杨国标   |
| 173 著名旅日爱国侨商吴锦堂                      | 郭振芝   |
| <hr/>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      |
| 181 论华侨在越南经济中的地位作用及其他<br>(1919—1939) | 徐善福   |
| 201 东南亚五国华侨金融业的特点、发展<br>与现状          | 黄朝晖   |
| <hr/>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      |
| 217 华侨教育与华文教育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周章楠   |
| 236 战后印尼政府的华人文教新闻政策剖析                | 黄昆章   |
| <hr/>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      |
| 253 全世界华侨、华人口统计资料                    | 黄朝晖整理 |

# 古代中国与文莱的关系

## 及华侨的活动

● 张 应 龙

文莱苏丹国是1984年才独立的年轻国家,面积只有5765平方公里。但在历史上,文莱曾是一个统治整个北加里曼丹(North Kalimantan,旧称北婆罗洲North Borneo)的强国。从1840年以后,文莱在西方殖民者不断蚕食之下,领土日见缩小,最后形成了当今北加里曼丹分为文莱与东马来西亚二部的格局。本文主要是探讨1840年以前中国与这一地区的交往关系及华侨的活动,故以文莱作为代表这一地区的实体。

文莱与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,但两国关系始于何时,实难断定。沙捞越博物馆自1948年以后曾数次对沙捞越河口三角洲地区进行考古发掘,出土了大量的中国陶瓷碎片和钱币等物,其中含有公元前的中国古钱〔1〕。荷兰考古学家在三发(Sambas)发现一把公元前一世纪的深绿釉龙勺〔2〕。因此,一些学者,如厄尔文(Graham Irwin)便认为早在公元前三世纪两国就可能有了交往〔3〕。海因·格尔登(Heine Geldern)认为达雅克(Dayak)族所用装饰品图案与中国晚周图案有关,故也持与厄尔文同样的看法〔4〕。以朱杰勤

教授的分析，加里曼丹作为马来群岛中最大的岛屿，应当会引起航海者的注意，所以汉代中国航海者应当到过加里曼丹〔5〕。上述这些推论，是从考古学、民俗学、中外关系史的角度进行探讨的结果。

据我国典籍所载，南朝宋后废帝元徽元年（473年），“婆利国遣使献方物”〔6〕。婆利地为何方，虽有歧说，但一般认为它是Borneo的对音，婆利即今加里曼丹。因此，中国与文莱的政治交往，至迟在南北朝时期已经发生。自此以后，有关两国的交往，史不绝书。

中国与婆利的政治关系，在南朝梁代时得到进一步的加强。梁天监十年（511年）“婆利国贡金席”〔7〕，“天监十六年（517年），（婆利）遣使奉表献金席等。普通三年（522年），其王频加复遣使珠智献白鹦鹉、青虫、兜鍪、玻璃器、古贝、螺杯、杂香药等数十种”〔8〕。在短短的十余年里，婆利与梁朝的政治交往就有三次之多，可见两国关系的密切。这种关系的出现，一方面因为此时的婆利是雄据东南海上的强国。

“国界东西五十日行，南北二十日行。有一百三十六聚”。“谷一岁再熟”。国王服饰均用金银珠宝，“出以象驾舆”，“其导以吹螺击鼓”〔9〕。婆利的政治、经济具有一定的水平。另一方面，南北朝时期的中国南方，社会相对安定，手工业、商业和海外贸易均比前代发达。特别是宋梁二朝，积极发展海外贸易，“舟舶继路，商使交属”〔10〕，梁朝有时每年要接待十几批外国商船〔11〕。正是在这种背景下，中国与婆利的关系在南北朝时期得到了初步的发展。

但从梁普通三年（522年）以后，两国的政治关系陷于停顿，不见于史籍。直至隋大业三年（607年）炀帝派常骏、

王君政出使赤土，发展中国与东南亚各国的关系，中婆的官方交往才重新恢复。隋“大业十二年（616年），（婆利）遣使朝贡”〔12〕。由于隋朝国祚短促，两国的政治关系未能得到较好的发展。

入唐以后，两国的政治、经济和民间的交流活动进入一个新的时期。

婆利，唐人又称渤泥，婆弥烂〔13〕。唐“贞观四年（630年），其王遣使随林邑使献方物”〔14〕。婆利这次来访，受到唐朝热烈的欢迎，宫廷画师阎立本亲为他们画像立存。此画现存台湾故宫博物院，成为两国历史关系珍贵的纪念文物〔15〕。虽然有唐一代，见诸正史的两国政治交往只有这么一次，但这并不意味着唐代两国的交往处于停滞的状态。从唐人所撰的《梁书》、《南史》、《隋书》等著作中，不难看出唐人对婆利的认识远比前人全面和清晰。这是两国通过各种交往关系进一步加深了解的结果。两国官方交往之所以稀少，主要是因为室利佛逝的崛起，婆利被迫臣服，造成中国与婆利政治关系的隔绝，但这并不影响两国经济关系及民间交往的发展。

唐朝是中国历史上一个繁荣昌盛的朝代。由于唐朝对外部世界实行开放的政策，从而出现千舶竞帆，万商云集的局面。随着海外交通事业的发展，中国与东南亚地区的交往进一步得到加强，人民出国活动的现象不断增加。

据考古发现，沙捞越河口三角洲地区是当时一个著名的国际港口和商贩集聚之地。由于泉州经台湾至菲律宾的航线尚未开通，中国与东南亚一些地区的交往，如与菲律宾群岛的贸易均通过加里曼丹转达而至。来自中国与阿拉伯的商

人，在这一地区开展贸易及从事其他生产活动。中国商人带来了碗、碟、罐、瓶、大瓮等陶瓷制品以及玻璃珠、石器、铁器、金器、钱币等物品，交换婆利的土特产〔16〕。沙捞越河口山都望（Santubong）地区的武吉马拉（Butit Maras）、望基三（Mangkissam）、宋加查旺（Sangei Jaong）、宋加武几（Sungei Buah）等地所出土的唐代陶瓷碎片、石器、玻璃珠、金器、开元钱币等物，便是唐代中国与婆利贸易发达的明证。在山都望地区，还出土了唐代华人坟墓和一些冶炼用的坩埚、铁制手脚镯及大量铁渣〔17〕。这表明，逗留婆利的中国人，除商贾之外，还有手工业者，他们可能由于维修船舶的需要，留在该地从事冶炼等生产活动。

根据唐代阿拉伯人写的著作，约8—9世纪之间，中国为控制沙巴海岸地区所出产的、久负盛名的樟脑贸易，曾派军队出征这一地区。后来这些中国军队便居留下来，直至室利佛逝控制婆利之后，由于与中国的联系被切断，他们才逐渐与当地卡达扎（Kadazan）族融合。正是因为有中国人在该地的活动和居住，因此，有些阿拉伯人将这一地区称为“小中国”〔18〕。唐朝军事征伐一事，中国史籍并无提及，从当时具体历史条件来考察，此说很难成立，但它却揭示了两国密切的经济往来与华侨活动的联系。

1981年，在福建晋江东石发现清嘉庆年间蔡永兼所写的《西山杂志》（手抄本）。该书林奎官条写道：“唐开元八年（720年）东石林知祥之子林奎，字安东，曾祖林智慧航海群蛮，熟知海路。林奎试舟至浚泥，往来有利，沿海畬家人俱从之去。引来番舟……晋江商人竞相率航海”。又，同书麦园条：“涂公文轩与东石林奎航海至浚泥……其地称涂

家涯，涯之北，有陈厝、戴厝，俱从涂之操舟人”〔10〕。如果我们暂时不去考辨该书的真伪，那末，从这段记载中，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认识：

1、林氏从其曾祖林智慧起便“航海群蛮，熟知海路”。经过几代人航海经验的积累，至林銮时终于“试航浚泥”，获得成功。

2、浚泥航道开通之后，由于“往来有利”，沿海商人“竞相率航海”，连少数民族如畬家人也“俱从之去”，可见两国民间贸易十分活跃。

3、涂文轩及随涂氏至浚泥的陈姓和戴姓“操舟人”流寓浚泥，成为华侨。涂家涯与陈厝、戴厝南北相连，形成村落。它的命名，既具有浓郁的中国南方文化色彩，又体现了血缘、地缘的特点。

因此，综合中外文资料及考古材料，我们可以看出，随着两国来往关系的发展，特别是民间贸易关系的活跃，在唐代时就已有华侨在婆利居住并形成小型的聚居点。

## 二

宋元时期中国与文莱的政治、经济关系及华侨的活动，均有较大的发展。

从唐末至宋初的一个多世纪里，由于中国的内乱和室利佛逝对浚泥的控制，使两国的关系受到严重的窒碍。到了10世纪中叶，宋朝统一了中国，重新振兴中国对外贸易，发展对外友好关系。与此同时，浚泥趁室利佛逝内乱之机，摆脱控制，积极恢复与中国的关系。

宋太宗太平兴国初年，有一叫蒲卢歇的商人，在从中国至閩婆的途中，因遭风暴袭击，入泊渤泥。渤泥正苦于缺乏谙熟中国水路之人，“此时闻自中国来，国人皆大喜”。渤泥王立刻“差人迎到州”，“即造船舶，令蒲卢歇导达入朝贡”。太平兴国二年（977年），渤泥王向打派遣由正使施弩、副使蒲亚里、判官哥心等人组成的大型使团出访中国。宋太宗对渤泥使团的来访十分重视，“诏馆其使于礼宾院”，最后厚赠使还。渤泥这次出访，重新打通与中国的联系。至元丰年间，渤泥又派遣使团来中国访问〔20〕。

宋代中国与渤泥的政治关系相当友好密切。渤泥王向打在致宋太宗的国书中，曾提出每年派人来华访问的建议〔21〕。虽然此议没有下文，但宋朝对发展两国的友好关系十分重视，将渤泥与占城、丹流眉、古暹、摩迦等国列为同一级别，予以优待〔22〕。当元丰五年（1082年）渤泥使节要求从泉州“乘海船归国”时，宋廷慨然应允，提供方便〔23〕。

中国与渤泥这种友好关系的确立，有力地促进双边经济关系的发展。据赵汝适《诸蕃志》所载：

“淳泥在泉之东南，去閩婆四十五日程，去三佛齐四十日程，去占城与麻逸各三十日程，皆以顺风为则。……番舶抵岸三日，其王与眷属率大人到船问劳。船人用锦藉跳板迎肃，款以酒醴，用金银器皿椽席凉伞等分献有差。既泊舟登岸，皆未及博易之事，商贾日以中国饮食献其王，故舟往佛泥，必挟善庖者一二辈与俱，朔望并讲贺礼。几月余，方请其王与大人论定物价，价定然后鸣鼓以召远近之人，听其贸易，价未定而私贸易者罚。俗重商贾，有罪抵死者罚而不杀。船回日，其王亦酺酒椎牛祖席，酢以脑子番布等，称其所

施。舶舟虽贸易迄事，必候六月望日排办佛节然后出港，否则有风涛之厄。……遇佛节，其王亲供花果者三日，国中男女皆至”。

渤泥关于商贾“有罪抵死者罚而不杀”的规定，有利于促进海外贸易的发展。渤泥国王与大臣都直接参与整个贸易过程，可见渤泥对发展与中国的贸易非常重视。双方在贸易活动中，贯彻平等互利的原则，关系融洽，结下深厚的友谊。

宋代中国与渤泥贸易的商品主要有金、银、假锦、建阳锦、五色绢、五色茸、琉璃珠、琉璃瓶子、白锡、乌铅、网坠、牙臂环、胭脂、漆碗碟、青瓷器等。中国商人以此交易渤泥的梅花脑、速脑、金脚脑、米脑、黄蜡、降真香、玳瑁等土特产。除了与渤泥进行贸易外，中国商人还通过渤泥，用白瓷器、酒米、粗盐、白绢、货金等物品，与渤泥周边的西龙宫、什庙、日丽、胡芦蔓头、苏勿里、马胆逾、马诺等地发展贸易关系〔24〕。

中国与渤泥友好关系的发展为华侨的活动提供有利的条件。中国商人每年在秋季风劲吹之际扬帆南下，至次年六月十五日“排办佛节”之后才回国，居留渤泥的时间将近一年。一些商人为与西龙宫等周边海岛贸易，只能“用小船来往”，逗留的时间就更长。因此，部分商人因商务上的需要在渤泥居留下来，是合乎情理的。除商人之类外，还有其他类型的人流寓渤泥。

1972年，在文莱首都附近爱丁堡桥一个伊斯兰教墓地上，发现一口宋代古墓，其碑文是：“有宋泉州判院蒲公之墓，景定甲子男应（甲？）立”。景定甲子即是南宋理宗景

定五年(1264年),但墓主为何许人,却无法辨认。以傅吾康和陈铁凡的见解,这个墓碑完全是中国式的,因此墓主是一个来自泉州的中国官员。他们还认为,蒲氏是已中国化的阿拉伯人,可能是蒲亚里或蒲卢歌二者之一的后裔,并且可能如同蒲寿庚家族一样,已有好几代人在从事与东南亚的海上贸易了。言下之意,蒲氏可能与蒲寿庚一样由经商而致仕〔25〕。当然,这都是一种猜测。但是,象这样具有一定身分的人物死于渤泥,至少可以证明宋代华侨在渤泥活动的历史事实。

有关元代中国与渤泥的政治交往,中国官方史书付诸阙如。但在西人著述中,却有元兵攻打渤泥之说。据一个于1323年到过婆罗洲,名叫奥都利克(Odoric)的修道士所称,元朝大汗曾曾多次派兵进攻大爪哇,但均被击败〔26〕。这里所说的大爪哇,与《马可波罗游记》中的爪哇岛一样,是指加里曼丹而非今日印尼之爪哇。据《马可波罗游记》所记:“大汗没有征服这个岛屿,主要原因是由于航路太远和海途多险这两点”。马可波罗还提及一个叫Lochac的地方,称该地盛产黄金,并输出海贝到其他国家,充作货币流通之用〔27〕。以尼科尔(Robert Nicholl)的考证,文莱叫海贝为Chongkak,所谓Lochac即Chongkak的错译。文莱是当时东南亚唯一输出海贝的地方,因此,Lochac即是文莱〔28〕。尼科尔的考证是否成立,有待进一步研究。但这里却提出这样一个问题,即元朝是否攻伐过文莱?

中国史籍未见有元朝对渤泥用兵的记载。西人著作中所称元兵攻打文莱的问题,可能与元世祖派兵征伐印尼的军事行动有密切的关系。元兵于至元二十九年(1292)年冬进攻

爪哇时，曾在勾栏山(即今格兰岛 Gelara Island)停留下来。

“国初，军士征阇婆，遭风于山下，辄损舟。一舟幸免，唯存丁灰。见其山多木，故于其地造舟一十余只。若橦舵、若帆、若篙，靡不具备，飘然长往。有病卒百余人不能去者，遂留山中。今唐人与番人丛杂而居之”〔29〕。元兵逗留勾栏山主要出自船破的原因。当然，二万元兵浩浩荡荡沿加里曼丹西南海岸而下，不能不对沿途产生影响，加上部分病卒滞留途中，最后与“番人丛杂而居之”，从而使这种影响得到传播和延续的条件。因此，所谓元兵攻打渤泥一说，应是从元军征爪哇衍生而来。

与这一传说相联系，还有关于元朝在沙巴设立行省的说法〔30〕。论者认为沙巴的中国江(Kinabatangan)和中国寡妇山(Kinabalu)是这种事实的见证〔31〕。Kina即China，意为中国〔32〕。有人还指出加里曼丹蒲打坦人(Putatan)蓄发辫的习俗，是蒙古人影响的结果〔33〕。但是，中国史书并无提及此事。象设立行省这样一个重大事件，官方典籍竟没有涉及，这简直不可思议。它显然是从元兵进攻爪哇而产生的另外一种附会。

据苏继庠的考证，《岛夷志略》一书中的渤泥，位于现在西加里曼丹卡普阿斯河(Kapuas)三角洲的坤甸(今属印尼)。渤泥在元末时，“为苏禄所逼，乃西迁坤甸或其附近以避之”〔34〕。如果苏继庠的考证正确，那末这将有助于解开所谓元朝在沙巴设立行省之谜。因为渤泥国都西迁坤甸一带以后，可能接受元军遗事的影响。当渤泥藉满者伯夷之力回到沙巴之后，便将此影响带到该地，从而最后制造出设立行省的传说。

尽管中国与渤泥没有正式的政治来往,但是两国的贸易却相当发达。元代中国与渤泥的经济活动,主要集中在都督岸、万年港和渤泥三地。都督岸即沙撈越河口三角洲地区,自古便是著名的国际商港。万年港即文莱港,此时因受苏禄的侵扰而衰落。渤泥在坤甸一带,是国都所在地。由于这三个地方发展不平衡,因此中国商人根据各地的需要输入不同的商品。如输往坤甸地区的中国商品是白银、赤金、色缎、牙箱;输往都督岸地区的是海南占城布、红绿绢、盐、铁、铜鼎、色缎;输往万年港地区的是铁条、铜线、土印花布、瓦瓶〔35〕。以所输入的商品价值和质量而论,渤泥最高,都督岸次之,万年港最低。但万年港从中国输入的瓦瓶却具有独特的价值,它在该地区具有特殊的意义。中国商人这种灵活的贸易方式,深受当地人民的欢迎,从而有利于加深和扩大两国人民的了解和交往。渤泥为管理对外贸易,“仍选其国能算者一人掌文簿,计其出纳,收税,无纤毫之差焉”〔36〕。这比宋代双方贸易以赠物品,“并讲贺礼”代税的方法,大为进步。它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元代两国经济交往水平的提高。

元代中国与渤泥贸易的发展,加上元朝统治者采取鼓励海外贸易的政策,因此,人民移居渤泥的活动也随之增加。上面所说的中国江和中国寡妇山,实际上是元代华侨在该地活动而留下的历史痕迹。华侨在当地从事各种生产活动的过程中,与当地人民建立了友好的关系,从而赢得当地人民的尊敬。渤泥人民“无敬爱唐人,醉也则扶之以归歇处”〔37〕。这充分体现了华侨与当地人民融洽的关系,成了千古流传的佳话。

明代是中国与文莱友好关系发展的鼎盛时期。

明朝立国伊始，即积极恢复和发展与东南亚各国的友好关系，多次派遣使团出国访问通好。明洪武三年（1370年）八月，明太祖派福建行省都事沈秩、监察御史张敬之率团出访渤泥。此时渤泥刚遭受苏禄侵略，后虽赖閩婆出兵救援，却因此而受制于閩婆。明使到达之后，渤泥王颇为踌躇。经过一番接触，双方了解渐深，渤泥王马合谟沙毅然决定与中国重结友好，并派亦思麻逸等人随沈、张二人来华访问。洪武四年（1371年）八月，渤泥使节到达南京。明太祖亲自接见来使，并“锡宴会同馆”。当渤泥使节回国时，明太祖赠送了大量物品，“赐其国王金文绮纱罗及其使绮帛有差”〔38〕。中国与渤泥这次互访，打开了两国友好往来的大门。

到了永乐年间，中国与文莱的友好关系得到蓬勃的发展，而渤泥王二次来华访问，更将这种友好关系推向高峰。

永乐六年（1408年）八月，渤泥国王麻那惹加那乃“率其妻子、弟妹、亲戚、陪臣，凡百五十余人”前来中国访问。这是明朝开国以来首次由国王率领来访的大型外国使团，因此，明廷十分重视，予以隆重的接待。当使团抵达福建时，明成祖即“遣中官杜兴等往宴劳之，仍命所过诸郡设宴。”渤泥使团在中国期间，明成祖“日命大臣一人，待于所舍，中贵人专接伴，盛其班张，丰其康飧。入朝班次上公，波漏至矣”。渤泥王给明廷带来了大量礼物，~~作为答谢~~明成祖也“优待礼隆，锡予甚厚”。双方的关系十分融洽友好。明

当双方畅抒友好之情时，渤泥王不幸染病不起，并于十月去世，年仅二十八岁。明成祖为之大恸，特辍朝三日，“东宫暨亲王各遣祭”。为满足渤泥王“体魄托葬中华”的遗愿，明成祖“命工部具棺椁明器葬于安德门外，树碑神道，求西南夷人之隶籍中国者守之。立祠于墓，命有司岁于春秋用少牢祭之”。为确保幼主遐旺的安全，明成祖特派中官张谦、行人周航护送回国〔39〕。渤泥国王墓于1958年在南京雨花台石子冈乌龟山发现，成为中国与文莱友好关系的历史见证〔40〕。

永乐十年（1412年）九月，渤泥幼主遐旺在其母及妻子陪同下，再次来中国访问。渤泥新王的来访，同样受到明廷的热烈欢迎和盛情款待。当渤泥王准备回国时，明成祖“赐金百两，银五百两，钞三千锭，铜钱千五百缗，锦四段，绮帛纱罗八十匹，金织金绣文绮衣各一套，并赐器皿、衾褥、帷幔诸物。赐王母及叔以下有差”。永乐十一年（1413年）二月，渤泥王带着中国人民的深情厚意返回加里曼丹〔41〕。

渤泥王的来访，为两国政治关系的持续发展奠下坚实的基础。据不完全统计，从洪武至洪熙年间，中国遣使至渤泥者有四次，渤泥入访中国者则达十次〔42〕，双方关系十分密切。这种局面的出现，与两国积极要求发展友好关系的强烈愿望是分不开的。洪武初年明使出访与永乐年间渤泥王二次来华，在中文关系史上都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重大事件。在两国的交往中，双方互相敬重，以诚相待，将两国的关系建立在和平友好的牢固基础上。正是双方不懈的努力，才使两国的友好关系得到空前的发展。

在这种极为友好的政治关系影响下，明代中国与文莱的经济关系也得到很大的发展。明代中文海上交通，除原来经

